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王爱和 著 [美]金蕾 徐峰 译 徐峰 校

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

上海古籍出版社

非外借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

王爱和 著 [美]金蕾 徐峰 译 徐峰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 / 王爱和著; (美) 金蕾, 徐峰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9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8973-9

I. ①中… II. ①王… ②金… ③徐… III. ①世界观—关系—政治文化—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B21
②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9589 号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

王爱和 著

[美] 金蕾 徐峰 译

徐峰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875 插页 5 字数 217,000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5325-8973-9

K·2543 定价: 5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朱渊清 陈 致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渊清	[美] 李 峰	[英] 汪 涛	[美] 张立东
陈 致	[日] 高木智见	唐际根	曹 峰

丛书序

“早期中国”是西方汉学(Sinology)研究长期形成的一个学术范畴,指汉代灭亡之前(公元 220 年)的中国研究,或是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研究,此一时期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都自成体系。以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教授于 1975 年创办 Early China 杂志为标志,“早期中国”这个学术范畴基本确定。哥伦比亚大学近年设置的一个常年汉学讲座也以“早期中国”命名。

“早期中国”不仅是西方汉学研究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实用分类,而且是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重要的实质性概念。

从最初的聚落发展到广大地域内的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秦帝国建立,并且在汉代走上农业文明之路、确立起帝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完善科层选拔官僚制度及其考核标准,早期中国经历了从文明起源到文化初步成型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早期中国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孕育、塑造了此后长期延续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编户齐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稳定维系;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低下;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被汉化,帝国疆域的扩张主要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文化同化的结果;各种宗教基本不影响政治,世俗的伦理道德教化远胜超验的宗教情感;儒家思想主导的价

价值观体系以及由此造就并共同作用的强大的官僚制度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力量,等等。追源这类基本性格形成伊始的历史选择形态(动因与轨迹),对于重新审视与厘清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历程,乃至重新建构现代中国的价值观体系,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期中国研究不仅是西方汉学界的研究重心,长期以来,也是中国学术研究中取得巨大进展的重要方面。早期中国研究在中西学术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这就是:扩充研究资料、丰富研究工具、创新研究技术,多学科协同不断探索新问题。

1916年,王国维以甲骨卜辞中所见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一一对照,发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之名,绝大部分出现在卜辞中。王国维把这种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互证的研究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出土文献资料在现代的早期中国研究中显示出越益重要的作用。殷墟甲骨100年来约出土15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34844片。青铜器铭文,1937年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著录金文总数4831件,其中绝大部分为传世器。《殷周金文集成》著录资料到1988年止,共著录了金文11983件。此后到2000年,又有约1350件铭文出土发表。最近二、三十年,简帛文献资料如银雀山简、马王堆帛书、定州简、阜阳简、郭店简、上博简等都以包含大量古书而深受关注。

严格地说,王国维说的地下材料,殷墟甲骨、商周金文都还是

文字资料,这些发现当时还不是考古发掘的结果,研究也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真正的考古学提供的是另外一种证据。傅斯年提倡“重建”古史,他主张结合文献考证与文物考证,扩充研究“材料”、革新研究“工具”。1928年,傅斯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立刻开始发掘殷墟。傅斯年在申请发掘殷墟的报告中说:“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从1928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37年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地点共11处,总面积46000余平方米,这15次发掘收获巨大:在小屯北地发掘了53座宫殿基址。在宫殿基址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甲骨。在小屯村北约1公里处的武官村、侯家庄北地发现了商代王陵区,发掘了10座大墓及一千多座祭祀坑。在小屯村东南约1公里处的高楼庄后岗,发掘出了仰韶、龙山和殷三种文化层的叠压关系,解决了华北地区这三种古文化的相对年代。在后岗还发掘了殷代大墓。在殷墟其他地区,如大司空村等地还发掘了一批殷代墓葬。殷墟王陵的科学发掘举世震惊。中国考古学也从开创之初就确立了鲜明的为历史的特色和风格。为历史的中国考古学根植于这块土地上悠久传承的丰富文化和历史知识的积淀,强烈的活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始终支撑着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近50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无比巨大的成就,无论是新石器时代城址还是商周墓葬的发掘,都是早期中国文明具体直观的展示。

不同来源的资料相互检核,不同属性的资料相互印证,提供我们关于早期中国更加确切更加丰富的信息,能够不断地解决旧问题提出新问题,又因为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而探寻无限更多的资料,而使我们对于早期中国的认识不断深入愈益全面。开放的多学科协同的综合研究使早期中国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其他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来说,早期中国研究的这种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或

许也有其可资借鉴的意义。

王国维、傅斯年等人是近现代西方科学思想和知识的接受者传播者,他们的古史研究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他们开创了中国历史学和中国学术的新时代。现代中国学术的进步始终是与西方学术界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的传播紧密相联的。西方早期中国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重要的研究方法,比如文明起源研究、官僚制度研究、文本批评研究等等,启发带动着中国同行的研究。事实上,开放的现代学术研究也就是在不同文化知识背景学者的不断交流、对话中进步。我们举最近的一例。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的一个重要基准点是确认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 899 年,这是用现代天文学研究解释《竹书纪年》“天再旦于郑”天象资料的一项成果。这项成果的发明权归属韩国学者,在断代工程之前西方学界已确认了这个结论。将“天再旦”解释成日出前发生的一次日全食形成的现象的假说是中国学者刘朝阳在 1944 年提出的,他和随后的董作宾先生分别推算这是公元前 926 年 3 月 21 日或公元前 966 年 5 月 12 日的日食。1975 年韩国学者方善柱据此假说并参考 Oppolzer 的《日月食典》,首次论证“天再旦”记录的是公元前 899 年 4 月 21 日的日环食(《大陆杂志》51 卷第 1 期)。此后,1988 年美籍学者彭颀钧、邱锦程、周鸿翔不仅也认定“天再旦”所记是公元前 899 年的日环食,并对此次日食在“郑”(今陕西省华县, $\lambda=109.8^{\circ}\text{E}$, $\varphi=34.5^{\circ}\text{N}$)引起“天再旦”现象必须满足的天文条件,第一次做了详尽理论分析和计算,并假设食甚发生在日出之时,计算得出了表示地球自转变化的相应的 ΔT 为 $(5.8 \pm 0.15) \text{ h}$,将天再旦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夏商周断代工程再次确认了“天再旦”这一成果,并为此于 1997 年 3 月 9 日在新疆北部布网实地观测验证。

本丛书不仅是介绍西方学者一些具体的早期中国研究的成

果,引进一些新的概念、技术、思想、方法,而且更希望搭建一个开放性的不断探索前沿课题的学术交流对话的平台。这就算是我们寄望于《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的又一个意义。

只有孤寂的求真之路才通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境。值此焦躁不安的文化等待时刻,愿《早期中国研究》丛书能够坚定地走出自己的路。我们欢迎所有建立在丰富材料缜密分析基础上、富有独立思考探索成果的早期中国研究著作。

著述和出版是长久的事业,我们只要求自己尽力做得更好一些。希望大家来襄助。

朱渊清

2006/12/2

写于学无知室

中文版序

本书是在我哈佛大学 1995 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于 2000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种子,本来还是八十年代从中国带出去的,绕世界转了一圈,今天又转回中国的土地。一粒种子,一个问题,飘洋过海成了一本英文书,蹉跎还乡又变成中文书,前后小三十年,可谓河东河西。为什么当年做完民族学田野调查,却一头扎在甲骨文里?为什么留洋不学经济法律现代化,却隔着大洋钻中国古代史?其关怀的问题从何缘起?探索的知识结构从何处来?其初衷今天回首又意味如何?审定书稿,觉得还是要跟读者交代一下才对。一本书,如一条小鱼,还应放生于历史的长河。

出去时,值八十年代中,北京刚修二环路,国人发展图变之欲,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谷,居一触即发之势。至于柏林墙倒,天倾西北,世界右转,那还都是未知未定未来事。我们那一届研究生论文题目,一律由上面指定作少数民族现代化问题。我的田野调查研究云南高山上的小民族。看到基诺族和佤族在革命和发展的左右开弓之下,其文化、人心、生态的破坏之惨烈,实在是中华民族之缩影。当时经过“反右”、“文革”,痛定思痛,心中缠绕的问题是咱中国怎么走了这么一条路;亲历过人整人、人斗人,真想知道人,到底

是什么东西。于是去找人类学的书来看,发现人类学已从研究异族文化转向自身的文化批判。那么,汉人要帮助少数民族现代化,怎能不先清算自身的野蛮中世纪?这一刨根,就刨到了秦汉商周甲骨文。为甲骨文求教于胡厚宣先生,竟然考上胡老的博士生。未入学,胡老说,你想用西方社会科学分析中国古代文化,有个人的书你得找来看,于是写下“张光直”三字。后来获得哈佛燕京博士奖学金,胡老又鼓励我出去开眼界。我的“西游记”就从这开始。

本书的知识架构,就是西游取来的。导师张光直先生一贯主张以问题为主,打破学科藩篱,自始至终支持我在中国历史和社会人类学齐头并进。从这两头,我挖到了阴阳五行文化和大一统政治这两条根,盘根错节实为一体。一次同张先生午餐,他在餐巾纸上写了“排山倒海,小题大做”八个字。他说,我一贯教导学生,论据要排山倒海,选题要小题大做。但你的题目例外,要大题大做。张先生的支持,使我有胆魄啃这大题。跨入社会人类学,启蒙之师是萨莉·莫尔(Sally Moore)教授。她犀利的分析思维,帮我磨砺了批判的武器。是她支持我破例以外系生身份通修人类学博士必修课并通过其资格考试,并主动为我组建了社会人类学和东亚双科博士委员会。我的另一位导师是斯坦利·J·坦比亚(Stanley J. Tambiah)教授,他开拓了我的跨文化比较和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当我随问题从商周游历到秦汉,鲁惟一(Michael Loewe)教授慨然赐教并应允承担论文秦汉部分的指导。这四位导师的引领,是我学术生涯的最大幸运。

我求学之时,国内文化热达到白热。一次哈佛播放《河殇》,中国学子无不动容。中日战争后百年间,国人深痛落后于人,一再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深挖文化深层结构、东亚病夫的黄色文明之病根。这是继“五四”、“文革”之后,文化决定论的又一次高峰。当其时处其境,我的论文当然要直面这个问题。您读了这本书,应当看

得出,我的观点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者如阴阳五行)并无永恒不变的实质实体;极权政治,也非铁打的衙门。其发生、应用、兴衰,都在活人,不在祖先。当年建立一统天下,汉武帝董仲舒立天为神,尊孔为圣,持春秋为大一统。这一统和独尊,一直被奉为是上承三代圣王之天道,下启两千年儒教道统,是中国文明始终一贯的典范;其实,那是通过几百年兼并血战、灭国屠城、焚书坑儒、罢黜百家,是通过暴力与机遇的偶合,走出的一条曲曲折折的血路,哪里是什么中华文明深层结构的必然规律。是人创造和使用文化,文化并不会打人、斗人、杀人。那是只有活人才能干出的。

今天,国人有钱了,财大气粗,不再问为什么落后于人,而是要拯救世界。不但拯救金融危机,还要拯救道德危机,满世界建孔子学院,传播中国道德文明。这好像是和“文革”唱反调,其实思维逻辑不改,都拿文化说事,无非是又要用祖宗建立道统,用道统有天下。回首,本书批判文化本体论,揭示活人如何因为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创造改造文化符号,又用文化塑造政治制度;这在今天一派尊孔读经升平景象中,竟然获得全新的意义。

完成本书英文版,历时十几年,在此期间,除了几位导师,我还得到多学者的支持与帮助。特此鸣谢。我起步时,有幸得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的教诲,并定期向他请教。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给予我一贯的鼓励,还对论文诸多章节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席文(Nathan Sivin)与吉德炜(David Keightley)读了英文版初稿,并与我分享他们的研究。叶山(Robin Yates)提供了诸多新出土文物的资料。巫鸿帮助我解读建筑史与美术史的材料。另外,许倬云、包弼德(Peter Bol)、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杜维明诸先生都曾坦诚赐教。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对本书涉及的周代材料给予详尽的批评建议,柯鹤立(Constance Cook)评阅了本书第二章,李峰则审读了该章的修

订稿。在人类学研究方面,我要感谢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莉萨·马尔基(Liisa H. Malkki)、华琛(James L. Watson)、华若璧(Rubie Watson)在理论上和我的讨论。和司徒安(Angela Zito)的长谈总是激励我的思维。而本书英文版得以面世,不能不感谢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将本书列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他还对书稿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此外,哈佛燕京学社博士奖学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博士论文奖学金以及普渡研究基金对本研究提供了经费。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与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则授予我成员身份,允许我利用其中心的图书资料。还有更多人和机构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未能在此尽数,我一并深表感激。

中文版的诞生,先要感谢摩尔教授早在我毕业之际的耳提面命:此书一定要翻译成中文。虽然捻转坎坷未能及时从命,毕竟不曾敢忘却。九十年代末还在普渡大学读书的金蕾女士主动将剑桥英文版翻译成初稿,后有幸请到徐峰博士完成翻译并校对。查良镛基金会香港大学文学院研究基金慷慨资助。香港的陈致教授和上海古籍的童力军先生对本书的支持使得出版最终成为可能。

没有如上诸多支持本书不可能问世。但本书的错误和不足,责任在作者一人。从英文版问世到今天,新的材料与研究不断出现,作者的认识也不断发展,按说该重写一本书。限于时间和人力,中文版只能忠实于原著,还是把这条小鱼,放回历史的长河中去,任自由。

2011年8月8日于香港

目 录

中文版序	001
图表目录	001
第一章 绪论	001
一、宇宙观与政治文化	001
二、学科方法论与研究命题	005
1. 历史学对起源的关注	006
2. 古典社会人类学与结构主义	010
3. 汉学研究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和修正	014
4. 考古学的新材料和方法论的新问题	017
三、从意识形态到文化逻辑：理论模式更新	021
四、中国宇宙观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的创新	026
1. 新命题：实践、身体、象征、权利	027
2. 跨学科方法	029
3. 文化和权力的谱系	031
4. 历史人类学与文化历史学	033
5. 理论与比较研究	036
五、古代中国与现代性	039
六、本书结构	041
第二章 四方与中心：晚商王族的宇宙观	044
一、导言	044
二、四方	047
1. 政治地理：“方”与“我”	047

050	2. 宇宙结构：四方
056	3. 祭祀结构：禘和“方”
058	三、中心
067	四、宇宙观与祭祀、政治活动
067	1. 空间与时间
075	2. 天与地
078	五、青铜时代晚期的四方
078	1. 克商
084	2. 向中心转移
088	3. 改造四方
092	4. 中心性的延续
094	六、结论
096	第三章 五行：历史变革中的宇宙观
096	一、导言
100	二、超越王权的知识和权威
100	1. 君王神权的篡夺者
104	2. 五行与国事
107	3. 五行与兵书
109	4. 官僚机构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五行
115	三、从中心走向循环运转
116	1. 宇宙运动之循环
117	2. 重整时间秩序
121	3. 对空间秩序的重新定义
125	四、关联：天人之际的新渠道
126	1. 君权的再创造
129	2. 文本与关联系统的建立
140	3. 宇宙观综合化和君权理论化

五、结论	154
第四章 宇宙观道德化与皇权的演变	158
一、导言	158
二、《汉书·五行志》	159
1. 《汉书·五行志》的内容	159
2. 《五行志》的结构	164
三、以力克天下还是以德承天下：围绕皇权性质的争辩	166
1. 水德和五德相克	167
2. 土德：五行相克与三统相承之冲突	172
3. 火德与五行相生	180
四、地、人、天	183
1. 地	185
2. 人	187
3. 天	192
五、结论	194
第五章 皇权之争：宇宙的中心和权力的枢纽	199
一、导言	199
二、灾异：魔力与天道之间	201
三、构建皇权的宇宙观之争	206
1. 朝廷文人与地方诸侯王	207
2. 董仲舒和淮南王	210
3. 宇宙观之争	213
4. 皇权模式之争	218
四、构建天下的政治之战	223
1. 文化和观念的大一统	223

225	2. 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
228	五、皇帝：权力之枢纽
228	1. 权力枢纽
231	2. 天人之际，身不由己
234	六、结论
238	第六章 结论：宇宙观和权力的再思考
238	一、宇宙观和权力的互相构建
241	二、政治文化的多面性
242	三、解构中国传统之“本质”
246	引用书目简称及版本
248	参考文献